戏曲史料建设的可贵探索

——《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评介

程 芸¹, 胡非玄²

(1.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61)

《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版)是朱伟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汉剧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集中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发表于京、沪、汉等地报刊上与汉剧相关的资料,不仅为今后的汉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而且,对于近代戏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史料建设而言,也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通常认为,汉剧至今已延续了三百多年,曾有“八百出”的剧目被创作或演出,长期兴盛于荆楚大地并流播到湘、豫、川、陕、闽、徽、粤、赣、黔、晋等地,对京剧的形成和楚剧、广东汉剧等剧种的艺术形态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或许是囿于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长期的“非中心”地位,汉剧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不仅远远落后于京剧研究,甚至落后于豫剧、黄梅戏、婺剧等地方戏的研究。点检相关文献,清末以来针对汉剧的著作可谓屈指可数,学界较为熟悉的大抵就是民国时扬铎的《汉剧丛谈》和《汉剧在武汉六十年》、阎金铎的《汉剧》,以及建国后刘小中、郭贤栋的《汉剧史源流》和邓家琪主编的《汉剧志》。还有一些著述(如王俊、方光诚的《湖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杜建国主编的《湖北戏曲概览》等)在论及汉剧时,虽然有不少新获,但其命意并不在于为汉剧而作专论或专史。可以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质、量,还是学术影响,汉剧研究在戏曲史研究中的地位,与汉剧本身的重要性,是不相匹配的。正因为如此,对汉剧艺术形态、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了。从这个角度看,朱伟明教授主持这项课题可谓应运而生。

要把握并厘清汉剧发展的历史阶段与不同时期的艺术形态,并进而管窥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就很可能陷入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乃至凌空蹈虚的境地。虽然前辈学人通过实地调查、采访老艺人、积累影音资料等方式,已经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积累,但相比于汉剧的辉煌历史和重要影响而言,这种方法并不足以获得充分的历史文化信息。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遗留物的汉剧,尤其是近代汉剧,必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中,留下诸多清晰的痕迹,这其中,晚清民国报刊上的相关资料,尤其值得重视。后人若欲“回念”汉剧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细节”、“过程”和“现场”(尽管是过去式的现场),报刊作为近代传媒的主要形态和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无论如何是不能忽视的。朱伟明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既敏锐地意识到汉剧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又借势于学界方兴未艾的报刊研究,以1822年到1949年武汉地区的报刊为主要的梳理对象,以京、沪地区相关的文献记载为辅助,经过披沙沥金般的发掘和整理,才形成这样一本特色分明而厚重的汉剧资料汇编,值得学界重视。

首先,该书将资料搜集整理的时段集中于清道光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期,时段的选择非常准确。这一百二十余年,一则是汉剧快速发展、演剧活动异常活跃、艺术形态逐步完善的时段,二则这一时段的汉剧资料较为分散,因此整理的意义更大。其次,该书所整理的资料内容丰富,涉及的领域较为多样。不但有汉剧表演艺术、剧目与演出的史料与评论,甚至连演员台下与演剧有关的生活,以及与汉剧有关的民俗文化等资料,也一并收录。这种“细大不捐”的编选,不但有助于汉剧表演艺术、剧目和演剧之研究,也有助于汉剧习俗与武汉戏曲文化之研究。同时,也可为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再者,为了方便读者,该书在编写体例上也可谓煞费苦心。编者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报刊资料,使得读者能够对汉剧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纵向把握;在书后附有“细目”,将每个篇章标明其出处以及对应的页码位置,为读者按需查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该书的出版,对于后来者的汉剧研究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价值。首先,由于该书资料辑录范围基本涵盖了晚清民国时的相关报刊,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者可以直接从该书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对自己研究方向有用处的资料,省去了自己查找资料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一些报纸,寻找其藏地、并进行翻看是有相当难度的,比如记载了大量民国汉剧资料的1935年的《罗宾汉报》(又名《汉口罗宾汉》),据我们所知,全国范围内似乎只有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堪称“孤本”;还有一些报纸,翻阅一次也非常不易,如1937年—1947年的《罗宾汉报》、《江声日刊》、《镜报》、《太阳灯》、《汉口导报》等,因为易碎而只能看武汉市图书馆或湖北省图书馆的缩微品,而国家图书馆所谓中心库也不过藏了这些缩微品的一部分。该书将这些不易获得的资料辑录出版,可谓嘉惠学林、其功厥伟。其次,该书在辑录资料时,既力求全面,也有所选择,如报纸上的戏曲广告、一些伶人轶事等并没有辑录,或辑录较少,研究者可以根据该书提供的报刊名录、馆藏地的介绍,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地去整理这些资料,从而获得新的发现、扩大汉剧研究的领域。

当前近代戏曲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要沦为京沪地区戏曲的研究,因为当前近代戏曲研究著述大都以京沪戏曲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如么书仪的《晚清戏曲的变革》、田根胜的《近代戏曲的传承与开拓》、北京艺术所和上海艺术研究所主编的《中国京剧史》等等,都是以京沪戏曲为主体的戏曲论著;即使是某些具有史料搜集、整理性质的戏曲编年与资料汇编,也以京沪为主体,而其他地方则较少涉及,如王汉民和刘奇玉的《清代戏曲史编年》、赵山林的《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19》、《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等。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人在研究晚清民国的戏曲时,比较关注少数著名的或连续出版时间较长的报刊,而其他更多的地方性报刊则往往被忽略了。从199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和近年来陆续问世的《民国京昆史料丛书》、《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等来看,近代戏曲史料的建设总体而言有偏重“大剧种”、“大都市”、“大报纸”的倾向。事实上,晚清以后随着报业的迅速崛起,戏曲与报纸的结缘可谓遍及全国,不只是《申报》、《大公报》等大报、名报有戏曲栏目,其他大大小小的报纸也纷纷开设相关栏目,如上海的《时事新报》、《亚细亚日报》、《乐园》、《梨园公报》、《罗宾汉报》、《晶报》等,北京的《顺天时报》、《新闻报》、《民主报》、《舆论报·瀚海》等,可谓不胜枚举。这些报纸上的某些戏曲资料曾被整理出版过,如周剑云的《菊部丛刊》,但大部分的资料很少有人去整理,遑论结集出版了。它们只能像散落的珍珠一样,偶尔为有识见的研究者所利用。此外,学界针对晚清民国戏曲的研究长期以来尤其偏重于京剧、昆剧,因此京沪地区的著作、期刊和著名报纸成为戏曲资料汇编的主要来源,而收罗、汇集其他城市地方性报刊上的戏曲资料,则可谓少之又少。实际的情况是,地方性报刊上的戏曲资料不但数量丰富,而且类型也极为多样,往往不但有地方剧种资料,也有京剧、昆曲这样的全国性大剧种的信息。以武汉地区为例,《大汉报》、《镜报》、《太阳灯》、《罗宾汉报》、《戏世界》等就记载着极为丰富的戏曲动态,不仅可以用来研究晚清民国时汉剧的历史进程和演剧情况,也完全可以用来研究京剧在清末民国时的汉口是如何传播、发展和影响其他剧种的。再进一步,如果南京、西安、广州、杭州、开封、重庆等城市的地方性报刊上的戏曲资料都能够得到详细整理,那我们就能获得研究京剧如何在京沪以外城市传播、发展的大量宝贵资料,近代京剧史的过程将更为丰满而真实,我们的研究也将能更真切地触及到戏曲生产、传播的“原生态”。

回过头来看,这本《汉剧研究资料汇编》所进行的正是这种弥补研究之薄弱环节、具有一定开拓性的工作。书中所翻检过的报纸近30种,《申报》、《武汉日报》、《汉口大中华日报》、《顺天时报》之外,其他报纸多为并不知名的地方小报,而这些恰恰是当前晚清民国戏曲资料整理时需要特别加强的环节。正因如此,汇编者眼光之独到、用力之刻苦,实为难得。其开拓精神,不但值得其他有志于深入研究地方剧种的学者的高度重视,也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如近代社会史、城市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启发或借鉴。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京沪戏曲活动领艺术、风尚之先,理应成为近代戏曲研究的重点,但在将京沪近代戏曲作为典型、代表来加以考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众多内地城市戏曲活动的研究。如果说京沪在近代戏曲艺术等诸多方面是“领跑者”的话,那么近代汉口、长沙、重庆、昆明、西安、广州等地更像是“追随者”;将“领跑者”作为研究的重心固然重要,但对于“追随者”的研究也同样重要,因为从范围看,这些“追随者”在“量”上更多。也就是说,要研究近代戏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变化,研究这些“追随者”应该是非常必要的。同京沪这些“领跑者”相比,“追随者”有自身的特点,即它们在城市化的程度上与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程度上都无法同京沪相比,那么它们的戏曲活动与变革必然与京沪有着一些不同之处,这是我国近代戏曲研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因此,研究这些“追随者”可以作为近代戏曲研究的补充,即将京沪近代戏曲的研究作为重心,将近代汉口等相近似的城市近代戏曲研究作为“次重心”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地方戏曲史料的辑录和整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显然,这本《汉剧研究资料汇编》将因其在这个领域内的示范性、导引性,而推动整个学界近代戏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仔细检阅该书所汇集的资料,也会产生一些“不满足”。如对《大汉报》资料的整理相对要偏弱,其原因,或许是没有找到《大汉报》更好的馆藏。编者大概主要依据武汉市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摘录了1917年3月1日至1917年4月10日这段时间内的相关内容,同时,也参考了《湖北戏剧研究资料》第十八辑上杨有珂辑录的1917年5月15日至1919年3月23日的相关内容。杨有珂辑录的《大汉报》资料有限,而据我们了解,武汉地区馆藏的《大汉报》所涉时段也不长,国家图书馆所藏《大汉报》的缩微资料则更为完整,时限大致从1917年到1924年,可供编者取舍的范围更广阔。此外,还有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料也被遗漏了。如《镜报》1933年7月2日有署名“老哈”的《亦娟亦优的汉剧坤伶》短文,对研究民国时期汉剧领域一个为今人“遗忘”了的现象——“狎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民国时期汉剧界“狎优”活动的资料文献非常有限,据我们目力所及,除了《罗宾汉报》记载之外,就是《镜报》的这篇短文了。此外,清代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也有几首描写道光年间“狎优”活动的竹枝词,也没有被汇集进来。这种遗漏,大抵反映了汇编者对史料“学术价值”的不同认知,一方面有必要尊重和肯定,但另一方面,该书作为“资料汇编”其应该承载的学术空间,或许也会因为编者“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主观取舍而稍显遗憾了。

[责任编辑:熊显长]